

图书、文献与交流

Library, Document & Communication

时困犹存劫后书

——抗战时期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活动

Book-collecting Activiti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Librar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周 旂

(中山大学历史系, 广州, 510275)

[摘要] 本文综合利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广东省档案馆收藏的岭南大学档案, 研究岭南大学图书馆在抗日战争各个阶段内的藏书建设活动, 分析比较战争前后藏书数量的变化, 再现了藏书从散佚到清点、召回的历史。透过岭南大学图书馆在抗战期间的藏书建设活动, 可知在抗日战争时期, 尤其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前, 国内各图书馆的藏书工作并非只是消极地转移文献, 寻找安全的保存地点, 同时也积极开展文献购求、筹募和接管工作, 注重收藏抗战文献、国学文献以及西文中国学研究文献, 共建共享文献资源, 并通过与外国学术机构的合作获得了大批重要的外文书籍。

[关键词] 岭南大学 教会大学 图书馆 馆藏建设 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797(2010)01-0060-10

[Abstract] The paper researches collection building of Lingnan University Librar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alyses the change of quantity of books and periodicals before and during the war, recaptures the history how the library lost books and periodicals, and recalled them, using the archiv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kept b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Guangdong Province Archives. The history of collection building of Lingnan University Library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dicates that libraries in China not only searched secure place for keeping collection, but also actively acquired, enlisted and took over document during the war, especially before Pearl Harbor. Document on the war and Sinology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 came at top of priority in collection building plans. All libraries joint developed and shared document resources, and obtained a large number of important foreign books and periodicals by cooperating with foreign academic institutes.

[Key words] Lingnan university Missionary university Library Collection build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本文综合利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制作的岭南大学档案缩微胶片, 和广东省档案馆收藏的岭南大学档案, 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岭南大学图书馆抢运、保护馆藏图书, 以及坚持在抗战的艰难条件下, 以其有限的经费继续进行藏书建设的历史。作为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所认定的中国两所 A 级基督教大学之一的岭南大学, 其图书馆在抗战颠沛流离的困境中苦心经营, 殚精竭虑地保护文化典籍, 在某种程度

上, 代表了当时中国国内各大学图书馆在抗日战争中流离失所、惨遭书厄的际遇, 以及图书馆人力求藏书不辍的坚定信念, 从中或可折射出隐匿的历史细节和时代精神。

1 抗日战争之际的岭南大学图书馆

1.1 图书馆概况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际的岭南大学已发展

[作者简介] 周旂, 女, 1982年生, 博士研究生, 已发表论文10余篇, 出版专著1部。

成为南中国一所著名的高校,纵的方面由高等预科而陆续扩充成大学、中学、小学以至幼稚园,井然联成一气;横的方面分设文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和医学院^[1],其“农科在华南素负盛誉,亦实不逊于国中任何同类学府。理科上溢佳誉于海外,期刊之科学季刊,夙为中西学者所传诵。……医科之前身为总理研习之地,传承悠远可纪念之历史,发展迅速,设备宏新,外国语学习在英文教学法之新创,予中等教育以特殊贡献。”^[2]

这所著名大学的图书馆成立于1906年,设在位于全校中央位置之马丁堂内。该堂是岭南大学在康乐校址的第一所永久性建筑,亦是中国第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马丁堂修建之初,其用途并非作为图书馆使用,但自1906年建成起,岭南大学图书馆即开始在其内偏隅一室。随着藏书日益增长,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马丁堂的一楼和二楼之全座,及三楼之一部份已全部为图书馆所用,面积约有二万方英尺,内设含中西文期刊阅览室、普通阅览室、教员阅览室、报纸阅览室和课外预览室在内的阅览室10间,拥有阅览座位232个;拥有书库5间,分别为普通中西文书库、中西文过刊书库、善本书库、已订日报书库及徐

甘棠先生遗书专藏室;另外马丁堂内还设有图书馆业务办公室6间。此外,岭南大学图书馆在科学院二楼还设有分馆一间,内有阅览室及书库各一。该分馆只入藏自然科学杂志,约有数千册,尤以整套的西文自然科学杂志为重^[3]。

1.2 抗日战争前的馆藏情况

于藏书数量方面,广东省档案馆所藏的岭南大学档案中,《二十六年度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案申请补助书》里所统计的图书馆藏书情况,或许是目前现存资料中,能够比较接近地反映出“七七事变”爆发前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数量的系统而又确切的数据。据《申请补助书》中1936年度“图书概况”的记载,在全面抗日爆发前,岭南大学图书馆馆藏共计180091册,其中图书162314册,内含中日文图书113631册,西文图书48683册;杂志3736种,17777册,内含中日文杂志2255种,5725册,西文杂志1481种,12052册(藏书情况详见表1)^[4]。据当时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季刊》第七卷第三期上刊登的一篇调查统计显示,以藏书及管理而论,岭南大学图书馆位列中国著名大学图书馆之第五名^[5]。

表1 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统计(1936年度)

类别	图书册数			杂志种数及册数						册数合计		
				中日文		西文		计				
	中日文	西文	计	种数	册数	种数	册数	种数	册数	中日文	西文	计
总类	30445	4202	34647	2255	5725	1481	12052	3736	17777	119356	60735	180091
哲学	1911	1910	3821									
宗教	4784	2108	6892									
社会	16448	7913	24361									
语言	2392	1504	3896									
自然	3731	9523	13254									
应用	5980	9151	15131									
美术	2820	748	3568									
文学	24986	8026	33012									
史地	20134	3598	23732									
合计	113631	48683	162314									

岭南大学图书馆馆藏中,最值得称道的重要及珍贵图籍大体可分为四类。第一,系统、完整的杂志收藏:岭南大学图书馆素以其系统、完整的馆藏学术杂志闻名于图书馆界,尤其是在西文自然科学杂志方

面,种数占全国图书馆之首^[6],馆藏有西文科学杂志共672种,几乎囊括所有世界顶级自然科学学术杂志,其中整套无缺者82种,如由伦敦动物学会出版的Zoological records,自1864年创刊以来完整无缺,在

时困犹存劫后书——抗战时期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活动

Book collecting Activiti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Librar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周 旂

国内当时仅此一套完整馆藏;再如《化学文摘》(Chemical abstracts),自1907年创刊以来即完整入藏。而馆藏2255种中文杂志中,整套无缺者达1143种^[7]。第二,藏有1911年(宣统三年)至1937年的日报全份,其中1911至1935年间的全份日报为老革命家梁少文先生惠赠,《中华图书馆学会会报》称此批完整的报纸为“重要史料,极不易得,国内图书馆之藏有全份者绝少。”^[8]第三,于善本古籍方面,有清代广东著名藏书家曾钊之旧藏抄本,其珍贵者有《中兴礼书》《皇明宝训》;而明刊本中之难得者,有明正德《四川志》《叶汉高全集》等。第四,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西文书籍,此类馆藏约有2000册,杂志70余种,其中珍贵的期刊,如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创办的《通报》(T'oung Pao),自其1890年创刊以来即完整入藏;西文报刊最著名的月刊《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亦是自其1868年创刊以来完整入藏;《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于1832年创刊)自1833年至1851年停刊为止,各卷期完整无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出版的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自1858年创刊起完整入藏。

1.3 藏书的组织与管理

在那个时代,岭南大学图书馆还以其藏书管理的精谨科学、井然有序而著称。20世纪20年代中期,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齐鲁大学图书馆馆长、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馆长等纷纷来函询问岭南大学图书馆如何对中文书进行编目、开架制度的管理以及如何对西文汉学书籍进行分类等问题^[9]。可见,岭南大学图书馆对中文书和西文汉学书籍的分类、编目,以及对藏书的管理在当时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据1936年9月出版的《岭南大学图书馆一览》介绍,“本馆图书,均经分类,盖聚同类之书于一处,最便于治学者之研究与检寻也。至本馆采用之分类法,中文书则由本馆自编,西文书则采用美国杜威氏十进分类法而加以修订。”^[10]对作为专藏的研究中国问题之西文书,则在分类号前缀以“Chi”(系Books on China之省写)以示标志,这批珍贵的专藏,目前绝大部分保存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关于著者号码,中文书则采用杜定友著者号码表,西文书则采用美国卡特所

编之C. A. Cutter's alphabetic-table。

为便于读者检阅馆藏计,图书馆所藏每书均编有著者目录卡片、题名目录卡片和主题目录卡片;如系丛书,则编有分析目录卡片。另外还编有所谓的“辅导目录卡片”,即“参见卡”和“见卡”。目录卡片的著录项目与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印的卡片完全相同,格式亦大体一致,仅索书号的位置略有不同,岭南大学目录卡上的索书号位于卡片左上角,分两行排列分类号和著者号,而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目录卡上,分类号与索书号并列排印在卡片右下方。

与其他图书馆不同的是,岭南大学图书馆将中文图书的题名、著者、主题、辅导和分析五种目录卡片按语种分别混排,中文书目录的排检法采用该校陈德芸先生发明之首字笔画法,西文书目录的排检按照字母顺序。

2 抗日战争初期:动荡与守护

抗战爆发初期,岭南大学收归国人自办后的第一任华人校长钟荣光已步入古稀之年,由于健康缘故,难以再承担掌管学校的繁重事务。故校董会接受了钟荣光辞去校长一职的请求,改聘其为名誉校长,而校长一职则由曾经担任过岭南大学副校长的李应林继任。与此同时,图书馆的人事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已经在图书馆服务了18年的谭卓垣馆长于1937年9月间应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之聘,离粤赴平。馆长一职则由图书馆原总务主任兼参考部主任何多源代理^[11]。图书馆还于1937学年度新聘职员四人,分别为西文编目主任沈缙绅,文书陈美兰,见习事务员黄玩彩和梁惠莲^[12]。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州虽然远离华北战场,暂未沦陷,岭南大学能够得以继续在康乐校址办学。然而战事持续推进,局势动荡不安,自1937年8月31日广州遭到日本战机第一次空袭后,空袭频频发生,然全校师生抱着“以镇静之态度,沉毅之精神,认真寻求学问,俾迟日对国家有更大贡献”^[13]的信念,努力正常地开展教学、科研以及各项日常工作。图书馆的工作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并根据战时的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

据《私立岭南大学校报周刊》第10卷第7期刊登

的《图书馆一月份统计表》显示,仅1938年1月份,图书馆收到图书共计293册,其中273册来自订购,20册来自捐赠;收到杂志共计1468册,其中来自订购545册,捐赠297册,交换626册;图书馆在一个月内,合计为697册图书编目,其中中文611册,西文86册;馆藏流通数量为1177册,到馆阅览人数2644人次^[14]。仅以1937年1月^[15]和1938年1月^[16]图书馆收到的中西文杂志种数为例,分析抗战初期的战势对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活动的影响,比较数据如表2所示。

表2 图书馆收到杂志种数比较

语种	比较月份	收到杂志的来源			按时到馆合计
		订购	捐赠	交换	
中文	1937-01	263	460	95	818
	1938-01	74	24	12	110
西文	1937-01	326	31	735	1092
	1938-01	326	41	744	1111

抗战初期岭南大学图书馆一如既往地坚持开展藏书建设工作,西文杂志的订购、捐赠以及交换工作并未受到国内战事的影响,各项数据与战前比较基本持平,而中文杂志的订购、捐赠和交换工作受战事影响严重,各项数据较战前都大幅下降,按单位月计算,战争初期按时到馆的中文杂志数量下降到战前数量的13.4%,其中图书馆通过订购所能收到的杂志的数量仅是战前的28.1%,通过捐赠所能收到的杂志的数量仅是战前的5.2%,通过交换所能收到的杂志的数量仅是战前的12.6%。

导致图书馆每月收到中西文杂志数量发生如此变化的原因,也不难分析。中国爆发全面抗日战争之初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处于酝酿之中,西方各国尚未卷入战争漩涡,故岭南大学图书馆向欧美国家定购的期刊、书籍自然会按时到达让处于战争大后方的广州。而当时中国国内的文化、学术重地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北方城市,“七七事变”发生后,此三座城市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相继沦陷,至1937年底战火已经蔓延至东北、华北及华东各省市。北方的学术机构、出版单位或惨遭轰炸,毁于一旦,或仓促迁移,颠沛流离,故杂志出版工作陷入瘫痪。

通过岭南大学图书馆这一个案,或许也可推知,

在抗战初期,处于战场后方的各类图书馆,在中文馆藏的建设方面基本上都陷入停滞、困顿的状态,但是对于与西方学术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或有能力向国外订购西文文献的大型图书馆,其西文馆藏的建设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中,并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开展藏书工作,抢救北方因战争散佚出的藏书。不断传来的战争噩耗,动荡不安的时局并没有使身处后方的各类图书馆放弃对藏书工作的坚守。

事实上,抗日战争的爆发也没有打消校内师生支持本校图书馆藏书建设的热情。在1937学年度伊始,岭大学生社团鸿社向图书馆捐赠了价值一百零四元大洋的影印《宋会要》全套二百册,在此之前该社团已向图书馆捐赠过影印天禄琳琅、《宛委别藏》、《乾隆内府舆图》等珍贵图籍。另有该校之李宝荣博士和施云孙在离校时,将各自所藏的珍贵西文图书二百余册赠送图书馆^[17]。

国外友人及学术机构也通过捐赠或交换书籍等方式大力支持抗战时期的岭南大学图书馆。1938年3月,岭南大学图书馆收到来自美国女作家 Maude Meagher 捐赠的杂志 World Youth, 该杂志系 Meagher 与友人在美国所创办^[18]。与此同时,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表示愿意以其出版的《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ent) 交换岭南大学图书馆所能提供的任何出版物^[19]。

岭大图书馆一方面为战时研究之需要,一方面为宣传共赴国难之目的,积极从事抗战书籍的收藏工作,并于1938年3月特辟“抗战读物阅览室”^[20]。抗战读物阅览室成立之初,拥有相关书籍及小册子约1300种,其中关于中日关系之书籍约1200册,抗战定期刊物约70种,战争资料照片约200张,其中60张是关于广东省的^[21]。

战争使国内学术出版物的出版限于停顿,为图书的采访带来极大影响;战火使国内的交通陷于瘫痪状态,几经周折订购到的图书、期刊往往迟迟无法到馆,甚至在邮寄途中遭受厄运;战争也消耗巨大的财力和物力,岭南大学图书馆1937学年度的经费中,仅购书经费一项就比上一学年度减少了1331.41美元^[22];而敌机对广州的不时空袭使图书馆藏书活动所面临的

时困犹存劫后书——抗战时期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活动

Book collecting Activiti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Librar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周旆

环境更加恶劣。但尽管面临以上种种不利条件,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工作仍旧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据统计,截止到1938年4月,图书馆所藏图书的数量达到176324册,比战前向教育部申请补助费申请书中所列之藏书数量(参见表1)增加了14010册,其中中日文书总藏量为125764册,西文书总藏量为50560册。于特色馆藏建设方面,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西文书入藏量达到2049册,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期刊种数达到311种,其中211种刊物已停止出版,此外图书馆还订购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编制的所有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卡片——无论卡片所描述的书籍图书馆是否有入藏,对于图书馆有藏的有关中国研究的外文书大部分都编制了索引;所入藏的广东本省方志达到约600套;另外还建立了完整的部级、省级及地方政府出版物专藏^[23]。作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在战时设立在广州的唯一通讯处,岭南大学图书馆还积极配合协会征求全国图书馆被毁事实及照片的工作^[24]。

岭南大学素来重视编制与本馆馆藏相关的参考工具书,以便利读者检寻和利用馆藏,这一传统没有因战争的爆发而终止。在抗战初期,《广东研究参考资料叙录》(李景新编)、《馆藏中文期刊(附日报)目录》、《馆藏善本图书题识》(何多源)和《中文参考书指南》(何多源)四种图书馆出版物陆续出版。

3 广州沦陷:几度迁移,风波不摇

3.1 迁馆香港

从1938年5月末、6月初敌机开始对广州实施狂轰乱炸,6月8日上午10时许岭南大学校地西侧被敌机投中三枚炸弹。虽然在此次空袭中损失不大,但是学校当局一方面通过美国基金会向美国领事馆汇报轰炸事件,由美国政府向日方提出抗议,另一方面开始着手考虑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方案^[25]。综合考虑学生的家庭背景、中外籍教师比例、学校的国际化背景以及华南地区的实际情况等因素,加之岭南大学早前与香港大学成功合作的经历,校方认为一旦广州沦陷,香港大学是岭大避难的首选之地。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华南战事遂告发生,岭南大学于当天即暂行停课,疏散员生。10月17日学校正式将校产归还美国基金会,18日岭

大最后一批行政人员撤离赴港,19日学校在广州的校址改悬美国国旗。10月21日,广州失陷,日军入城后承认岭大广州校产为美国人所有,故无骚扰,屋宇、图书、仪器种种一切校产毫无损失^[26]。

岭大师生撤退到香港后,根据之前与香港大学达成的协议,借用香港大学的教学设施继续办学。协议中规定了岭大借用港大校舍及设备的范围,在图书馆方面规定如下:(1)香港大学西文图书馆,岭大教职员可随时入内阅览,学生则每日下午可入内阅览;(2)香港大学冯平山中文图书馆,师生均可随时入内借阅;(3)在冯平山中文图书馆内指定两阅览室,专供岭大陈列参考书,开馆时间特别延长至晚间九时半,专为岭大学生之用^[27]。

在迁港之初,图书馆首批运港的图书仅约1250种,多系各科主要参考书^[28]。岭大图书馆在港大落脚稳定后,只是着手将原有馆藏中2万余册的善本图书,分装12箱迁至香港,其余15万余册藏书交该校美国基金会保管,仍存于广州校址的马丁堂内。

自1938年10月底至1941年12月底的三年香港岁月里,岭大图书馆在战祸横生、经费短绌的情况下顽强开展藏书活动。于购书政策方面,秉承战前“无论何种学科新出版之中文书,一律全部购买”的方针,对新出版之中文图书仍极力购置如果,尤其重视关于抗战建国书籍和国学研究书籍之购置^[29];而对于各类学术期刊,因受经济困难、大量期刊停刊等因素的影响,则难以为继,故阅读量大为减少,即使是在战前被公认为全国收藏最完备、堪称馆藏特色的西文自然科学期刊,亦因经济关系,难以继续全部订阅。幸运的是,图书馆尚可利用该校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出版的《岭南科学杂志》,每年与国外各学术机构交换获得外文学术期刊数百种^[30]。

据《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14卷第1期刊登的《岭南大学图书馆近讯》,截至1939年5月3日,岭大图书馆存港书籍合计5911册,其中中文书2414册,西文书1784册,中文杂志(未订本)722册,西文杂志(未订本)985册,日报(已订)33册^[31]。而到1939~1940学年度末时,在港藏书数量仅图书一项已达到11540册,内中文8972册,西文2568册^[32]。至迁港第

三年,即1940~1941学年度,图书馆之经费为抗战爆发以来最多的一年,合计年购书经费达港币13150元,其中包括订购国学图书的专款,教育部津贴之特款国币五千元,以及美国基金委员会补助的订购西文自然科学期刊之经费一千美金。一年内合计新增图书5135册,其中中日文书3956册,西文书1179册;新入藏期刊578种,其中中日文336种,西文242种;订购日报22种,计香港12种,上海3种,重庆3种,东京1种,北平1种,广州2种。存港图书共计17618册,其中中文13529册,西文4089册;存港期刊1368种,内中文824种,西文544种。在图书编目方面,为中文书编制书架目录卡片314张,著者、题名、主题目录卡片9434张;为西文书编制书架目录卡片837张,著者、题名、主题目录卡片3494张^[33]。

3.2 保存国故

1938年11月至1941年11月是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前期,这一阶段内,日本改变了侵华策略,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了一系列伪政权,同时推行奴化教育。在这一大背景下,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增强民族意识,而促进建国大业”,于1940年1月8日发布了《发扬吾国固有文化》的命令,对全国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提出了9项要求:应尽量使用本国教材;教师应整理我国先哲有价值之学术,与西洋同性质之学术作比较研究;应特别重视中国通史、断代史及各种专史的教学;加强与海外开展东方文化研究的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或学术团体的合作;注重调查和保护学校所在地临近的古物建筑、名胜古迹;聘请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做演讲;教师应指导学生开展有关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及演讲会等;利用各种集会启迪学生对于固有文化之信心;各大学研究所之各学部,应注意整理中国材料,研究中国问题,翻译中国典籍,并负向世界学术界宣传介绍之责^[34]。

岭南大学遵照教育部令,于1941年3月成立中国文化研究室,并获得美国基金会的拨款补助。因中国文化研究室之成立,图书馆每年的购书经费中就增设里订购国学图书的专项经费。在研究室甫一成立的最初3个月内,图书馆获得了购置国学图书之经费1600港元。运用这笔经费,图书馆在1941年中购入

了一批重要的国学研究方面的中文书籍以及西文汉学书籍。如伪满洲国国务院辑印之《大清历朝实录》4485卷1220册,以港币1138元在北平大同书店购入,此为研究清史之重要史料,且印数不多。再如郑振铎编著之《中国版画史》,此书已出二辑,共8册,用珂罗版乳黄色罗纹笺或上等宣纸彩色木版套印,内容印刷装潢,均极精美,为国人研究中国版画史之第一部巨著。此外,美国基金会还另向图书馆拨发专款200美金,用于购买北平方面影印之西文汉学书籍^[35]。

当时岭南大学图书馆无论是在国内搜求国学研究之中文书籍,还是向国外订购西文汉学书籍,都是通过美国的东方研究机构合作进行的,重要的合作伙伴有夏威夷大学东方文库、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美国国会图书馆东部以及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中国学研究委员会。原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谭卓垣此时担任夏威夷大学东方文库主任,因其对岭大图书馆的馆藏了如指掌,于藏书建设方面颇有建树,故当时主管图书馆事务的岭南大学美基会秘书黄念美(Olin D. Wamamaker)多次致函谭卓垣,委托其协助岭南大学图书馆建设中文馆藏。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方面,则主要由岭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何多源与汉和图书馆馆长裘开明书信联系,一方面岭大图书馆根据汉和图书馆定期开列之书单和需求,代理其在中国国内购书之事宜,另一方面岭大图书馆在此过程中,参考汉和图书馆的购书政策,进行本馆的藏书建设活动;与此同时,岭大美基会根据哈佛燕京学社1936年出版的Check List of Important Western Books on China(第二版)拨发专款,代岭大图书馆在美国订购相关书籍,如在1940~1941学年度,美基会就为岭大图书馆订购了费希尔(Fisher)的《汉代中国绘画》(Die Chinesische Malerei der Han Dynastie)、多马·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所译的《大清律例》(Ta Tsing Leu Lee)、Voretzka的Altchinesische Bronzen以及《新疆佛教艺术》(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等重要的西文汉学书籍^[36]。在对国学研究方面的中文书籍、西文汉学书籍的选择和购买方面,岭南大学图书馆与美国国会图书馆东部以及美

时困犹存劫后书——抗战时期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活动

Book collecting Activiti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Librar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周旆

国学术团体协会中国学研究委员会也多有联系。

3.3 流离失所

尽管因战争缘故而寄居香港大学的岁月是艰苦的,但是经过三年的磨合,岭大师生们还是渐渐适应了香港的环境,习惯了利用港大正常教学、研究活动的间隙时间开展岭大自己的教学、研究工作。就在包括图书馆藏书建设在内的学校各项工作日渐步入轨道,并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香港局势开始恶化。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岭大师生不得不再次停课,陆续撤离香港,学校迁回内地,筹备复校计划。因时间仓促,加之日军占领香港后有计划地对港文化名人、文化机构加以控制,岭南大学存于香港大学冯平山中文图书馆、中国文化研究室以及香港岭南分校的书籍无法搬运,只能就地保存。

岭南大学存于原广州康乐校址的藏书亦面临危机。在抗战的最初四年里,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不仅幸免于难,而且在数量上仍呈增长趋势,然珍珠港事件后,由于日本对美国宣战,故日军迅速侵占了岭南大学在广州的康乐校址,存于该校址的交由美国基金委员会保管的约15万册藏书遂沦于敌手。最初敌军将存于马丁堂图书馆的藏书全部搬往女生宿舍,后伪省立广东大学在康乐校址上成立,所有藏书又被用车运回马丁堂,移交伪省立广东大学使用^[37],其中部分藏书被伪省立广东大学分别移交给该校附属中学、伪南武中学、伪鸣松中学、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等学校^[38],以及敌东亚研究所、敌陆军医院等日军机构。经数次之辗转、移交、搬迁,图书散失严重。

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正是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中后期,也是抗战岁月中局势最为严峻、战势最为惨烈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岭南大学面临着重重危机,进入前所未有的艰苦时期。危机之一是经费问题,当时美国已经卷入战争,使得美国基金委员会的资金来源缺乏,难以一如既往地支持岭大,学校如果坚持办学就必须在战争形势下自筹大量经费。危机之二是复校选址问题,事实上自香港沦陷至抗战胜利的四年间,岭南大学基本上始终处于颠沛辗转、流离失所的状态。

香港沦陷后,岭南大学在广东省政府、国民党第

七战区司令部的帮助下,择定韶关曲江县仙人庙镇大村作为复校校址,学校将此处原属军队的60多间茅屋和临时房屋改建为办公室、实验室、课室、学生宿舍、食堂和教工宿舍,还陆续增建了40多座临时校舍,其中包括一座图书馆。为增加图书资料,校长李应林亲自发动捐书运动,从联系到的校友处获得支持,充实学校图书馆^[39]。

4 战后图书的清点与召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8月16日,岭南大学即着手展开回迁广州康乐园校址的工作,9月5日正式收回康乐校园^[40]。图书馆随校迁回广州后立即开展图书清点和召回工作,董理丛残,收拾遗佚。

正如前文所述,岭南大学图书馆在抗战前藏书颇丰,其数量在全国大学图书馆中占第五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因日军承认岭南大学之校产为美国所有,故在广州托美基金会保管的藏书未有损失,加之迁校香港的三年间,图书馆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开展藏书建设,至1941年底香港沦陷前,图书馆在广州和香港两地已合计拥有藏书约20万册,其中中文藏书约142000册,外文藏书约58000册^[41]。然随着日本对美国宣战,岭南大学图书馆在广州和香港两地的藏书亦沦于战火。

广州光复后,图书馆携带在粤北仙人庙上课期间所藏的图书约1万册随校迁回^[42]。于1946年3月间,图书馆又由香港运回图书杂志18320册,其中中文书4843册,西文书3631册;中文杂志已装订者225册,未钉者4066册;西文杂志已订者108册,未钉者5188册;已钉日报359册^[43]。

在广州,图书馆接收了在战争期间被伪省立广东大学占据的图书馆的全部藏书,据接收清册记载,接收藏书的数量为179143册,其中包括属于伪省立广东大学的藏书1万多册。但在接收回的近18万册藏书中,有3万多册为未编目及复本书,多系私人藏书和中山大学出版的杂志,故不能计入岭南大学图书馆的馆藏。综上,岭南大学图书馆实际接收的藏书数量中英文合计仅约14万册^[44]。

随后,图书馆又从其他四处收回图书、杂志约

10402 册, 分别为: (1) 敌东亚研究所收回中文图书及杂志共 8367 册; (2) 中大植物研究所收回植物学杂志 21 册; (3) 敌陆军医院收回西文科学图书及已装订之杂志共 1984 册; (4) 在岭南大学牧场(前敌人住宅) 搜回西文图书三十多册^[49]。

综上所述, 岭南大学图书馆从仙人庙校址和香港两地运回之图书, 接收藏于被伪省立广东大学占据的图书馆内的藏书, 以及从敌东亚研究所、中大植物研究所、敌陆军医院和岭南大学牧场四地接收回的图书杂志, 即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后, 岭南大学图书馆实际保存下来的藏书约有 18 万册, 比香港沦陷前的藏书数量减少了约 2 万册。而因战争而损坏、被盗或以其他方式损失的藏书数则达五六万册之多。

在图书馆所有藏书损失中, 若按价值计, 则当属存于香港的藏书损失较为惨重。因为广州沦陷后, 图书馆曾将 2 万余册善本书迁移到香港; 而在港期间, 因“发扬国学研究”之政策, 图书馆又购买了大批重要的国学书籍以及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西文书。这些书在香港沦陷后均未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岭南大学图书馆在香港的藏书损失情况如下: (1) 存般若含道中国文化研究室之图书杂志约 11000 册(内有《大清历朝实录》1120 册) 全部散佚; (2) 寄存司徒拔道岭南分校之善本图书十二箱中失去第六箱, 内藏《通报》(Toung Pao) 全份, Chinese Repository 两整套, 影印明本《金瓶梅词话》及四种罕传广东县志。至于保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中文图书馆之图书因有人保管, 则损失甚微^[49]。

战前的岭南大学图书馆, 其藏书以外文书籍、西文自然科学期刊、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西文书以及广东省方志而著称。经过战争的洗礼, 图书馆在这些方面的藏书损失甚为严重。故战后的岭南大学图书馆将关于中国(尤其是广东省) 问题研究的西文书以及西文自然科学期刊作为优先发展的馆藏类型。在重建馆藏的计划中, 还强调建设各科教科书及参考书类的馆藏, 注意收集关于二战和世界和平方面的书籍^[47]。

5 结语: 一段历程与一种精神

抗日战争是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史上最大的灾

难, 随着战线从华北向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的一路推进, 战火蔓延、波及之处的图书馆建筑与藏书均遭到严重的破坏。翻开有关图书馆史研究的专著、论文, 一串串有关图书馆以及藏书损失的数字触目惊心, 尤其是近年来发表的关于抗战期间我国图书与图书馆事业方面的研究论文, 基本上围绕图书与图书馆事业损失情况开展研究, 包括记述侵华日军破坏文化典籍的史实, 统计图书资料损失概况, 以及日本对掠夺我国文化典籍的指示方针、目的动机、日军掠夺我国文化典籍的组织机构等方面的问题。

然而, 透过岭南大学图书馆在抗战期间所开展的藏书建设活动, 或可窥见在抗战所带来的不可磨灭的记忆中, 除了损失与伤痛, 还有未曾中辍过的藏书建设活动, 有中国图书馆人对藏书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的信念。尽管战争年代的图书馆学研究工作几乎停滞, 但是战争期间的图书馆事业实践却为今日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素材; 尽管“新图书馆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图书馆事业的繁荣发展势头因战争而戛然而止, 但是“新图书馆运动”所倡导的近现代图书馆理念却未因战火而焚灭。

5.1 关于抗战时期的藏书建设

通过对抗战时期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建设活动的研究, 可以发现在整个抗战期间, 尤其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前, 图书馆的藏书工作并非只是消极地转移文献、寻找安全的保存地点, 同时也积极开展文献购求、筹募和接管工作, 一方面努力弥补战争损失, 另一方面力图确保对用户开展正常的文献服务。由岭南大学图书馆这一个案研究所得出的这一结论, 事实上也适用于迁馆到战场后方地区的各类图书馆。以图书馆事业颇发达的上海为例, 抗战爆发后, 有幸逃脱被毁、被占或停顿厄运的各类图书馆均择以安全地址, 照常开展工作。如震旦大学图书馆为法国教会设立, 战争之初未收日军滋扰, 于战争期间慨允接受他处寄藏图书, 并时而收到来自法国教育部等机构或个人的捐书; 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将一部分藏书迁至南京路大陆商场, 后又租用梵王渡俱乐部大厅, 着手添办书架, 增加设备, 中西文卡片目录亦次第迁入, 又得华东基督教教育协会拨款, 购置大批书籍; 由中国

时困犹存劫后书——抗战时期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活动

Book collecting Activiti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Librar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周 旖

科学社所创设的明复图书馆,一切工作照常进行,“所订各国著名杂志,经馆中函请,各国学术团体及出版家均慨允赠送”,并着手编印中西文书本目录;鸿英图书馆的主要工作为剪报及编制索引,战争期间仍照常进行,惟出版之“人文月刊”宣告停顿^[48]。再如燕京大学,1939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因由平迁往他处,故将所有存书杂志及调查材料计五十箱全部捐赠燕大图书馆^[49]。

在所购文献语种方面,由于战争对我国的文献出版事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中文书刊的收集极为困难,所以各图书馆如经费充裕,则着力搜求北方及江南各地散佚出的私家藏书,尤其是地方志。1938年下半年以后,随着各出版机构在西南地区恢复出版工作,中文书刊的采访困境才略有好转。而西文文献方面,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若排除经费因素,各图书馆向国外订购西文书刊仍可照常进行。但无论是中文书刊还是西文书刊的采访,因战事阻碍交通,故书刊邮寄分外困难。

在藏书建设专题方面,毋庸置疑,抗战文献是当时所有图书馆的收藏重点,有关抗战问题的书籍、杂志、报纸、地图、歌本、照片、幻灯、电影、标语、传单、画片等等均被纳入图书馆的收藏范围^[50]。而另一主题的文献收藏则鲜为人知,即对国学文献,或者中国问题研究的文献的收藏。从前文所述可知,岭南大学图书馆在对国学文献,以及中国问题研究方面的文献收集工作上投入了大笔专项经费,并积极与国外各学术机构通力合作。作为由教育部颁发的《发扬吾国固有文化》训令,其影响显然是全国范围的,从岭大一馆的情况或可推知当时全国各图书馆对国学文献、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文献收藏之盛,亦可以此为切入点,与美国各东亚图书馆的藏书史并然联成一气。

5.2 文献资源的共享

抗战期间,全国各类图书馆在文献资源方面开展共享活动,以求同赴国难,共渡难关。岭南大学在香港期间,不仅与香港大学图书馆共享馆藏文献资源,还得到国立北平图书馆驻港办事处的慨然相允,将国立北平图书馆存港图书选择一部分借与岭大师生使用^[51]。再如南京杭州等地相继沦陷后,应迁沪的金陵

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之江大学、东吴大学和沪江大学的要求,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将该校在南京路大陆商场内的临时图书馆扩充为华东教会大学联合图书馆,供上述各校师生阅览,而全部馆务仍由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原有职员主持,另由其他各大学推举委员三人,协助开展工作;圣约翰大学在梵王渡总馆所藏之书籍也允许以上各校师生借阅^[52]。

5.3 文献资源的联合采访与国际合作

通过对岭南大学图书馆抗战期间藏书建设的研究,不难发现在此期间内,岭南大学图书馆在藏书建设工作上广泛与国外各学术机构开展合作,或共享购书目录,或共享文献来源的信息,或作为外国学术机构在华购书的代理机构共同进行文献采访工作。事实上这种文献资源的联合采访与国际合作并非仅存在于岭南大学图书馆,而是在全国各类图书馆间广泛开展的。

抗战期间,因交通受阻、与外界联系困难、文献资源奇缺、经费短绌、外汇购买困难等原因,图书馆界萌生了进行文献资源联合采访的意向。1939年在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上,中华图书馆协会提交“全国各文化机关征购图书应集中办理案”,会议决议将此案提交教育部办理;此次会议还通过了协会还提出的“请筹设文化机关及图书馆旧书复本交换处案”,呈请教育部令出版品国际交换处筹划办理,以统制各文化机关及图书馆交换复本事宜,以有易无,互相调剂,藉省人力财力^[53]。

1939年3月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教育部提出“各院校购置外国图书杂志应求联系”,拟定《国立省立私立专科以上各院校购置国外仪器图书及教育用品暂行办法》,组设国外仪器图书购置审定委员会和国外教育用品代办处^[54]。在该年年底又成立了征集图书委员会。在与美国图书馆协会联系,为国内各图书馆募征图书杂志方面,著名图书馆学家袁同礼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谋求外国援助,加强文献收集的工作,在抗战期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39年11月岭南大学就收到了从美国征募而得的西文图书22种28册^[55]。外国对华的文献资源援助从抗战一直延续到抗战结束后。事实上,这种国际

合作的意义不仅仅限于在抗战年代文献奇缺的条件, 弥补国内文献资源建设的不足, 使学术弘扬, 弦歌不辍, 它还有利于对外输出抗战宣传文献, 以利国际宣传, 提高中国在国际上之声誉。同时这种国际合作使中国图书馆学界与国际图书馆学界的交流合作突破了战前限于理论和学术领域的局面, 深化了国内外图书馆学界的认识与了解。虽然战争年代的合作模式难以复制, 但是蕴涵于其中的经验, 以及从此形成的历史认同感, 对于今天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 1, 4, 7 二十六年度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案申请补助书 (1936年)。广州: 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 38-164。
- 2 李应林等。特殊教育委员会报告: 岭南大学教育政策初步研究 (1939年11月17日)。广州: 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 38-1-24。
- 3, 10 岭南大学图书馆一览。广州: 岭南大学图书馆印行, 1936: 5-6, 8, 10。
- 5, 11, 17 图书馆消息。私立岭南大学校报周刊, 1937, 10(1+2): 11-13。
- 6, 29, 32 私立岭南大学各院系现况 (1939年度)。广州: 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 38-1-2。
- 8 岭大图书馆消息四则。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6, 12(3): 41。
- 9 燕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图书馆馆长 T. T. Hsu 致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 J. V. Barrow 函; 齐鲁大学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图书馆馆长 Donald D. Parker 致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 J. V. Barrow 函; 岭南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致圣约翰大学 (St. John's university) 图书馆函。广州: 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 38-4-182。
- 12 本年度新教职员。私立岭南大学校报周刊, 1937, 10(1-2): 9。
- 13 李代校长纪念周演讲。私立岭南大学校报周刊, 1938, 10(6): 2。
- 14, 16 图书馆一月份统计表。私立岭南大学校报周刊, 1938, 10(7): 8。
- 15 图书馆一月份统计表。私立岭南大学校报周刊, 1937, 9(14): 195。
- 18 美国基金会 Dr. James M. Henry, Provost 致何多源函, 1938年3月16日。广州: 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 38-4-534(306); 何多源致美国基金会 Dr. James M. Henry, Provost 函。广州: 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 38-4-534(305)
- 19 S. Bliss eff 致何多源函, 1938年3月10日。广州: 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 38-4-534(296)
- 20 图书馆开设“抗战读物阅览室”。私立岭南大学校报周刊, 1938, 10(8): 12。
- 21, 22, 23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Library of Lingnan University (1938年4月), 岭南大学档案缩微胶卷 reel36, 中山大学图书馆。
- 24 本会设立通讯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8, 13(1): 17。
- 25 岭南大学校董会第四十七次会议记录, 1938年6月27日。广州: 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 38-1-19。
- 26, 27 本校概况报告(一)——民廿七年九月至廿八年二月。岭南大学校报港刊, 1939(13): 67, 72。
- 28 本校概况报告(二)——民廿七年九月至廿八年二月。岭南大学校报港刊, 1939(14): 73。
- 30 岭南大学图书馆随校迁港后之现状。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9, 13(6): 24。
- 31, 51 岭南大学图书馆近讯。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9, 14(1): 21。
- 33, 35, 36 《岭南大学图书馆馆务报告(1940.7-1941.6)》, 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校史室。
- 34 教育部令发扬吾国固有文化。岭南大学校报港刊, 1940-02-19(52)
- 37, 42, 43, 46 何观泽。广州香港各图书馆近况。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46. 12, 20(4-6): 3-7。
- 38 派员赴南武中学领回图书, 1947-03-30; 证明移交图书杂志小册子共六九五五册由, 1947-01-11; 致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之函如派员认领图书杂志请予协助由; 1947-01-08; 致中正学校函如派员认领书籍请予协助由, 1947-01-08。广州: 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 38-2-37。
- 39, 40 陈国钦, 袁征。瞬息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12: 103-104, 111。
- 41, 47 Questionnaire of University Libraries。广州: 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 38-4-87(131)
- 44, 45 图书馆近况报告。广州: 广东省档案馆。全宗号: 38-4-87(108-110)
- 48 钱存训。上海各图书馆被毁及现况调查。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8-11-30, 13(3): 5-8。
- 49 燕京大学图书馆受赠大批书报。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9-07-20, 14(1): 20。
- 50 范并思等。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6: 247-248。
- 52 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战时消息。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8-11-30, 13(3): 22-23。
- 53 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有关图书馆事业决议案汇录。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9-01-31, 13(4): 9。
- 54 第三次全教会通过有关图书馆之议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9-05-30, 13(6): 13-18。
- 55 本会赠送岭南中山二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39-01-30, 14(4): 11。

(收稿日期: 2009-07-31)